

RHETORIC ITS THEORY AND METHOD

封面设计：宋名道
责任编辑：魏亚洲



后，致信给他说：

“多年不见，听朋友说，你曾去北大进修，由于积极钻研，进步很快，这次阅读你的大作，确信此言不虚，这使我十分高兴，语言学后继有人，是很值得庆幸的事。

……

你的论文吸取了西方信息论、心理学、美学等学科中的一些新论点，用新的方法，对修辞的性质、特点、手段、效应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颇有创见，看来此路可行，继续努力下去，可能为修辞的研究开拓一个新的境界，这是一。

文章引用的资料很丰富，可以看出作者读书较多，能注意国内外学术动向，并善于吸取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分析全面细致，是一篇专题研究有得之作，文笔也很流畅，这是二。

在传输手段的体系上，讲了积极修辞手段的形象化、强化异化和催化，很好，如能论述消极修辞手段，则更为全面，另外，谋生型、游戏型的名称及提法，似可斟酌。这是三。

本文吸取国外的引文较多，新名词也多，如能把某些提法化成中国习惯的说法，可读性将更为增强。”

理论语言学家，80年代中在模糊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语言和思维的关系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果的北京师范大学的伍铁平教授在读了他的《修辞研究的文化视角》一文后致信赞扬说：

“旁征博引，很有学问，文笔也很好。”

胡老和伍先生都是我所敬重的。他们的评价我当然都是同意的。

三

敏感，勇于探索，这是青年知识分子的长处，也是山东这本论著的一个特色。

探索又首先集中在现代化这个问题上。1981年《修辞学习》创

刊号上我发表了《修辞要现代化，现代化要修辞》一文，同年我又在《修辞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呼吁：

“应当加强理论研究”。“重视研究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

“修辞学要成为一门科学，要做到现代化、精密化、模式化，就应当重视研究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科学化。”

（《修辞·语法·文章》30，31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

1987年山东在复旦大学纪念陈望道先生逝世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现代化中的修辞研究与修辞研究的现代化》，从现代社会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来论述修辞学和现代化的关系，是比较深入的，是不多见的同类文章有点特色的一篇。

学术研究是社会的。显然，山东的这一论文是接着我1981年的话头在深入，而我在1990年1期《湖南师大学报》上发表的《再论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一文是对一些中青年学者的回答，其中也包括了山东这一论文中关于修辞学研究对象的论述。

在成都会议上，关于中国修辞学的出路，有人强调现代化，有人强调民族化。我在80年代初强调现代化，但现在主张提科学化的口号，因为现代化即科学化，科学化即现代化，现在是一个科学化的时代和社会。即从山东的论著看，他的中心在于现代化，但所谓现代化实质上是如何科学化。即使修辞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可以用数学来描写的科学。

中国修辞学如何现代化和科学化，这必将是90年代中国修辞学的中心议题，山东的意见也是一家之言，值得注意的。

四

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在80年代是十分流行的，被广泛地运用于人文科学的各个部门。修辞学界有不少人也努力运用三论于修辞学。我以为这对于汉语修辞学的科学化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也写了《修辞的层次观》等文。

在80年代，象山东这样全面探索信息论和修辞学的关系，用信息论来构建一个新的修辞框架，一个新修辞格框架，对修辞学的对象和修辞效果进行新的解释，还是不多见的。

山东的这一个探索对汉语修辞学的科学化是有益的。我只想补充一点：实际情况比山东设想的要复杂得多。例如研究对象和表达效果吧，我在近年来的讲演和论文中，一再惊讶这比我们过去的设想要复杂得多。1987年我就说过：

再说更麻烦的事儿吧：表达效果的评定，以说写者的自我感觉为标准呢，还是以听读者的反映为标准呢？这两者有时是矛盾的。而且从听读者方面来评价，麻烦事儿也挺多，有时候听读者当时十分感动，但事后却反感万分，可也有相反的，当时火冒三丈，不共戴天，事后却又心悦诚服，感激万分。假如有两个以上的听读者，他们的反映大不相同，听谁的？以谁个为标准，真叫人头疼。

表达效果取决于交际活动中多种变量的相互关系，这是每一个使用语言文字进行交际活动的人不得不经常多想想的。

（《曹子建、崔巨伦及其他》原载香港《普通话》1987年第2期。

《说话的情理法》7—8页，湖南师大出版社，1989年）

这当然是每一个努力使修辞学现代化科学化的人所不能不考虑的。

当我努力运用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和高等数学来描写修辞现象的时候，我们必须当心：

一方面，我们认为修辞学是一门科学，它能够运用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及高等数学，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看到，这些“论”和“学”在描写修辞现象的时候又都有无能为力之时。这是因为完全充分地描写修辞现象的“论”和“学”尚未诞生，因此我不可以以修辞现象去迁就这“论”那“学”，反之，则应当从这些丰富复杂的客观存在着的修辞事实出发，从对这些事实

的研究中创建新的“论”和“学”。我相信，对修辞现象的研究将创建新的高等数学，这新的高等数学比现在的高等数学在描写修辞现象方面是更为简便有力有效。

这是成都会议上我即席发言对一些青年同志的回答，我写在这里，供山东等青年同志在运用三论和高等数学于修辞学时参考。

五

关于文化修辞学的探索，我只指出一点，我们应该区分：

社会语言学——语言社会学

文化语言学——语言文化学

文化修辞学——修辞文化学

这应该为两种不同的学科。

山东强调现代化，科学化，人文化，我建议他进一步考虑一下：人文化同现代化的关系，人文化同科学化的关系。这对他的文化修辞学和整个修辞学探索是有益的，我认为。

记得奈斯比特在他的名著《大趋势》一书中说过：

“高技术一定要有高情感结合才能不致于被人排斥。”

真正的言之有理；真正的科学化和现代化，真正必须充分考虑和体现人文性和人情味，一点几也不假。因为归根到底，人类的科学是人类主体对宇宙的一种认识，一种“逼近”，一种描写，而这一认识、“逼近”、描写，归根到底又是从人类的角度并为了人类的，即“人本位”。离开了人类主体，科学和科学化岂不成了几句空话？没有人情味的科学化人们怎能会有感情呢？而现代化，正是人类历史进程的现代化，是就人类而言的，是人类所追求的，离了人类，还谈什么现代化又如何能够现代化呢？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事儿呀！

但是正如 80 年代新加坡学者郑子瑜先生发起持续几年的语法和修辞结合的讨论一样，有时也颇叫人头疼，对于语法和修辞

能否及如何结合的大问题，我至今是一言不发。一方面也许这个问题本来并不值得讨论，太简单！另一方面也许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又太复杂了。

那么，科学化和现代化与人文性到底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呢？如果是两回事，那么是否有主次或相对独立性呢？如果各自有独立存在的价值，那么各自对对方的制约和影响的程度有多大呢？可否认为科学化就是科学化，现代化就是现代化，它们不可以被人文性所代替，虽然必须考虑到人文性呢？

这些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山东和一些中青年同志都在考虑，我想在90年代我们会得到比较满意的认识的。这对90年代中国修辞学的发展和繁荣将是一个积极的促进因素。

六

80年代的中国修辞学，实事求是地说，主要是中年人，即中国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他们基本素质好，但创新精神差一点，多少有几分保守。到了90年代，中年人中还将会有一些人继续在这个舞台在“苦斗”，扮演“一代风流”的修辞学正剧，但他们决不能“独霸”中国的修辞学舞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在90年代，至少将是中年和青年平分秋色于中国修辞学舞台，如果青年还不能够独领中国修辞学90年代的“风骚”的话，会不会由哪一方“牵头”，“执牛耳”，而另一方只处于捧哏的地位上呢？我现在还不知道。

我只是从修辞科学本身的发展来看，不希望中年和青年来一场梁山泊大拼杀，而应当友好竞争而互补。从中年来说，勿学白衣秀士王伦，而要多提拔后进，多看青年长处，可又要从严要求，不捧杀不打杀。而从青年来说，应该善于学习中年的长处，这也大有益于自己的成长。

作为80年代中后期走上修辞学舞台的年青人重山东，不但主

编《云梦学刊》有办法，刊物越办越好，得到学术界的好评，而且做学问有自己的特色，在众多的年青的修辞研究者中已独树一帜，这很好。

我相信，90年代里山东将做出更大的成绩。我支持他，正如我对修辞学界其他年青人的支持一样，因为我们中国修辞学的希望在年青一代。在90年代中，年青一代的修辞学论著会多起来的，我期待着。

对山东来说，80年代始终抓住了方法论这个关键问题，比较注意从宏观上，从哲学认识论上来探索修辞问题，能够联系心理学、美学、文化学、信息论、系统论等多学科的成果来考虑处理修辞问题，努力拓展修辞学的领域，这是他的长处，是应当肯定的。但同时也并没有忘记或忽视对具体材料的收集和积累，这是难能可贵的，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之中，又能同修辞事实相结合，这时候出成果便不难了。所以对于他90年代作出新的更大成绩，我是相信的。

让我们一同迎接90年代中国修辞学的大发展和大繁荣吧！

1990年9月17日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目 录

序：修辞学的现代化必须理论先行（王希杰）	1
----------------------------	---

1 修辞学与现代化

1. 1 现代科技发展的鲜明指向	1
1. 2 处在科技发展前沿的修辞学研究	4
1. 3 修辞学现代化的三个“W”	6
1. 4 年代之交的修辞学审视	11
1. 5 新世纪到来前的选择	17
1. 6 新时期小说语言的试验与意义	21
1. 7 修辞学面临的新课题	26

2 修辞学与信息论、心理学、美学

2. 1 修辞的系统发生与研究价值	29
2. 2 适应论——修辞手段功能发生的前提	32
2. 3 语言工具本身和语言接收对象心理特征	33
2. 4 修辞手段的功能类型	43

2. 5	修辞手段功能发生的动态模型	53
2. 6	狭义信息论对修辞研究对象的理解	56
2. 7	广义信息论对修辞效果的科学描述	63
2. 8	魔棒与化学剂——形象化修辞手段的心理基础与妙用	68

3 修辞学与文化学

3. 1	文化视角——修辞学深入发展的一种必然	72
3. 2	修辞文化研究的理论价值	73
3. 3	修辞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	79
3. 4	修辞文化研究方法的逻辑前提	92
3. 5	修辞研究文化视角的基本层次与方法	97
3. 6	人类语言中对称形式的普遍依据	100
3. 7	对偶：汉语言文化的有意味形式	103
3. 8	对偶是汉语言材料的结晶	104
3. 9	对偶对汉族审美意识的认同	106
3. 10	对偶是汉族思维模式的镜像	109
3. 11	对偶是汉语表述特征的反映	113
3. 12	何谓“文化精神”	115
3. 13	贯注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文化精神	116
3. 14	中学语文教学怎样贯注文化精神	118

4 关于修辞学“学”

4. 1	多层次多视角的掘进	123
4. 2	历程的必然性与对象的必然性	125

4. 3 理论要有超前意识——谈王希杰修辞学研究 方法的意义.....	126
后记.....	137

修辞学与现代化

1. 1 现代科技发展的鲜明指向

人类进入 20 世纪以后，新技术革命的浪潮迅猛崛起，席卷全球，强烈地冲击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日益改变人们的生存环境、生活情态和思维方式。“体现这个浪潮新特点的不是过去工业革命时期那种仅仅在于解放人的体力劳动，而是进一步解放人的脑力劳动；不只是满足于过去那种科学上一门门传统的研究和探索方式，而是同时冲向横断学科、从纵横交叉的复杂组合中去进行最佳开发”^①。透过现代科学发展的波峰浪谷，不管是宏观的外星探测，还是微观的中子分裂；不管是海洋的开发、遗传密码的揭示，还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我们都可以从中发现它的奔涌走向，用得上和鲁迅先生指

^① 见赫伯特·A·西蒙《关于人为事物的科学》第 3 页朱春林“校后说明”。解放军出版社 1985 年 7 月版。

出魏晋时代文学的风度是“人的主题，文的自觉”同样的表述方式，它的鲜明指向也可以归纳为：人的中心，方法的自觉。

(1)、所谓人的中心

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是人类对主体和客体认识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主体不断发展、不断外化的历史。经由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的体力不断延伸到机器上，人们还要把自己主宰这个世界、作为宇宙之灵的智能在机器上得到体现。人类一千四百克脑量的大脑作为“黑箱”装置，已经成为未来科学最难攻破，也许是最后攻破的一个堡垒，成为人类最终认识自己、真正进入自由王国的实现目标。当代科学也就紧紧围绕这个目标集结着大量的学科参与、攻坚。同时，人的因素在现代社会生活领域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马克思曾一再强调：“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①，作为社会运行过程中唯一的活的因素——人，占有着社会的全部发展。关于人的问题成了现代科学系统中的中心问题。

自本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科技界出现两场大革命，第一场是由于半导体电子学的发展，加速地推动了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科学的发展，出现了电子科学技术的大革命。第二场是由于生物遗传学的发展出现的“遗传工程”新技术而引起的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大革命。这两场革命，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研究人本身，它们都是积极地服务于人类最高的进步和文明目标。它们都逐步地反向人的自身认识，逐步地要求对人的智能的深刻彻底的揭示。谈家桢说：“如果说20世纪头50年中物理学和化学飞黄腾达，那么后50年……就是生物学的全盛时期，到21世纪初，……对心理学……的研究，恐怕将成为一个重点。人为什么会思维，能记忆，把那么多知识藏在脑子里？……人们在物理、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

学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探索这方面的规律，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①。

人类把自己的体力在机器上得到延伸，解放了人的体力劳动，创造了人类灿烂的文明，人类要把自己的智力授给机器，它将会给人类展示无比辉煌的前景，仅止目前阶段，人类还只将其智能的一小部分在电子计算机上得到体现，就已经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②，而这种艰巨工程的最终实现又将是多么令人兴往、令人振奋发的啊！难怪它不得不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中心。

(2)、所谓方法的自觉

恩格斯在谈到 19 世纪下半叶的自然科学走进了理论的领域时说：“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就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能有所帮助”^③。进入 20 世纪，科学的发展更进一步证明了理论思维的重要性，这种理论思维体现在科学发现的方法上形成了方法上的自觉。它一方面表现出人们逐步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用严格的实证和数学精化的方法对客体的主体进行认识和描述。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把握、经验概括、笼统表述的方式，请看古代中西方哲人对世界的认识：“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④。“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抱阴而负阳……。”^⑤“土

① 见《百科知识》1979 年第 1 期第 60 页。

② 目前世界电脑的 70% 集中在美国，其完成的工作量相当 4000 亿人整整一年的手工工作量，有一个材料说，日本的某些大企业能在五秒至一分钟之内通过电脑获得世界各地金融市场的行情；一至三分钟可以获得日本与世界各国进出口贸易的资料；三至五分钟内，可查询或调用到国内一万个重点企业当年和历年生产和经营的情况（参见居延安《信息、沟通、传播》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5 页）。

③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27 页。

④ 《老子书》第 25 章。

⑤ 《老子书》第 42 章。

死则水生，水死则气生，气死则火生；反过来也是一样”^①。这种系统的观念也许一直影响着现代物理学的发展^②，但它的思维方式、认识过程、表述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了，对“天下万物”的生源、运动，人们已经从实证的科学和精细化的描写上进入到原子的阶段，用理论思维逐步替代经验思维。

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出现了多科学的综合，横断学科的互相渗透，在方法上以更加接近客观规律本身的方法研究所研究的对象。马克思说：“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③现代新方法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的出现以及对各门科学的渗透应用就是如此，它清楚地表明人们在从理论思维的角度，更深刻地利用科学的方法来揭开自然世界和人类自身的奥秘。巴甫洛夫感觉到：“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我们便仿佛升高一级，因此，也就为我们开拓了更广阔的眼界，使我们能看到从前看不见的对象”^④。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⑤。这种“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清醒认识已经成了现代科学发展的又一鲜明特征：方法的自觉。

1. 2 处在科技发展前沿的修辞学研究

修辞学是研究语言运用的。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需要向修辞学研究提出了十分迫切的任务。美国著名的科学

① 赫拉克利特《论自然界》，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0页。

② 见《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页。

④ 转引自《文学研究新方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5页。

⑤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9页。

家、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的创始人西蒙说：“一个关于人类思维的理论，不可能，也不应当避免涉及人类最突出的认知技能——语言的使用”^①。

50年代末以来，开发计算机功能的科学家们着手进行着两项工作：第一，由计算机提出定理；第二，计算机下棋。到今天，在国际市场上，只要花几百法郎（美元）就可买到一个利用运筹技术设计的程序的会下棋的微机，而能够提出定理的计算机至今尚未问市。个中原因在于：后者——定理的提出，需要一种能够形成概念并使之合理化的能力。赋予机器的这种智能，首先必须有人类这类智能的精细描写，而其中人类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过程，是无论如何避不开语言的使用的。

因此，在与神经生理学，心理学等一道探索大脑“黑箱”装置奥秘的攻坚中，语言运用的研究也是揭示大脑思维、人类认知的一个重要途径。恩格斯说：“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的化学的运动，但是难道这样一來就把思维的本质包括无遗了吗？”^②很显然，思维本质的揭示，思维过程奥秘的破译必须借助于人类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的深入研究。难怪不少科学家断言：在当前及未来的时代中，语言学发达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首先是电子工业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当代美国的著名实验语音学家方特（Gunnar Fant）指出：计算机技术和微电子学的革命所展现的光明工业前景，如果没有语言科学的进展，就会象浪潮上的冲浪板触礁一样以搁浅而告终”^③。

① [美] 赫伯特·A·西蒙《关于人为事物的科学》解放军出版社第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1页。

③ 见《语文导报》1985年12期。

迎合着当代科学的发展,语言学研究中,由语法形式的研究逐步进入到了语义深层的探讨,今天又已深入到语用规律的揭示,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话语语言学的迅速兴起就代表着这种趋势,它大大地扩大了修辞学的疆界,在方法上带来了较为深刻的变革,推动了修辞学的研究。它对人的语言行为深刻揭示的研究成果将直接服务于人机对话、人工智能的研究。

另外,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信息革命的到来,人们的语言交际行为越来越频繁、复杂,而探讨、发展人际交流的语言艺术已成为当今世界人们直接追求的目标。《大趋势》作者奈斯比特说:“在信息社会里,竞争与对抗出现在人与其他人的相互作用之中,这是有了人类文明以来的第一次”。“在这个文字密集(Literacy—Intensive)社会里,我们比以往更需要具备基本的读写技巧”^①。因此,现代化社会里的修辞学研究对人们语言运用艺术的指导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3 修辞学现代化的三个“W”

作为一门既古老而又年青的学科,修辞学被现代化推向了科学发展的前沿阵地。但是,目前修辞学研究还远远不能适应这种现代化的需要。在这个学科领域,无论是对它发展趋势的认识,还是科学研究方法的应用都显得十分落后,十分单薄。

那么,在“人的中心,方法的自觉”的现代化发展的今天,修辞学研究面临哪些历史重托?应该怎样确定自己的发展大势?应该如何改革自己的研究方法?至少可以有以下对象是什么(What)、手段为什么(Why)、效果怎么样(How)三个方面:

^①〔美〕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8页。

(1)、研究对象是什么的界定

修辞学研究什么？从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发表后，80年代以前，基本上停留在两大分野——消极修辞、积极修辞的范围。在修辞研究领域，对于手段的作用，有的人偏狭于积极修辞这种美辞研究，而忽视（甚至否认）了消极修辞这种更为一般，更为基础的手段研究。对手段的层次，只注重字、词、句、格具体片断的手段，而失轻于篇、章、体整体效果的探讨。对手段的范围，只重视书面事实，而缺乏口语考察等。

过去的修辞，多被定义为“对语言进行修饰和加工”，正如吕叔湘先生指出的：“好象说话写文章都可以先有一个朴素的‘坯子’，然后对它进行修饰。”^①这种认识歪曲了修辞的事实，缩小了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产生“种种流弊”，对此，吕先生指出，“修辞学，照我的看法，应该是在各种可供选择的语言手段之间——各个（多少是同义的）词语之间，各种句式之间；各种篇章结构之间，各种风格（或叫做‘文体’、‘语体’）之间——进行选择，选择那最适合需要的，用以达到当前的特定的目的”^②。这是十分精当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人们的言语活动——修辞看成一个信息传输过程的话，不论是积极修辞使言语增加信息量，还是消极修辞，使言语荷载信息量，都是修辞手段的范畴，它们都具有传达信息的基本功能，都是经过修辞过程的选择才运用的。因为，一方面任何人表达、传输信息，只要不是胡言乱语，不是诸如小孩子学着说话玩，哪怕是自言自语（自言自语时也是把自己当作听者

① 吕叔湘《我对于“修辞”的看法》，载《修辞和修辞教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 页。

② 吕叔湘《我对于“修辞”的看法》载《修辞和修辞教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 页。